

再现丝路文明的魅力

□ 张显传

众所周知,“一带一路”是指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,这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,它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一部分,也是文明史观应予关注的关键。

丝路的开通

秦王扫六合,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,将中华文明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。汉武帝继续推行大一统的格局,凭借汉初雄厚的经济基础,削弱封国势力,强化监察制度,施展他的雄才大略,使中央集权空前加强。但是,汉初,河西走廊和西域部分地区为匈奴所控制,汉朝政府与西方联系的道路不畅通,双方交流难以通达。汉武帝起用卫青、霍去病率军先后发动三次大的战役,对匈奴等势力采取攻势并取得成功,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联系,标志着丝路文明的开启。

如何从文明史的视角来评价汉武帝这一行动的表现?

文明是人类创造的,包含物质、精神、政治和文化等因素,因此,文明史观应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、从事物的变与不变的结合上,来认识事件本身的特征。换言之,文明史观重视对于历史运动本身的理解,重视对于变化的认识。

汉武帝是个爱好历史、喜读史书的君主,处事断义无不高举“《春秋》之义的大旗”。他又是个经常问政于臣的君主,董仲舒著名的“天人三策”就是君臣二人从历史的角度来阐发自己观点的对话。汉武帝讲的是“五帝三王之道,改制作乐而天下治和,百姓同之”的盛事,问的是“三代受命,其符安在”?并对于当时流行的“久而不易者,道也”的说法提出疑问。董仲舒回答的是“道者,万世亡弊。弊者,道之失也”,要求守道、救弊。

如上所述,“武帝始事改革政治,所创诸制,多与后世有关”,如建年号、策贤良、黜

百家、用儒吏、用夏正、尚文词等七项。说明他是主张改革西汉政治,寻求社会变化的。

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丝绸之路时,与广大臣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实践。公元前138年,汉武帝派张骞率100多人出使西域,途中两度被匈奴扣留。13年后,只剩张骞与胡妻和助手三人返回长安,一路历经艰辛,但给汉武帝了解西域各国情况提供了真实的依据,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域的决心。公元前119年,张骞带领300多人再次西行,又派副使出访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等国,4年后,由他陪同乌孙国使者回到长安,从此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,加强了与西域各国和各地的联系。

从文明史思维视角来说,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,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。汉武帝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特定的历史看法、历史见解、历史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。从开辟丝路文明的全过程看,在可变与不可变的思维模式上看,从他们的实践活动看,他们所创建的文明历史也是有意义的。

文明的远播

所谓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,汉初专指今日我国新疆天山南北为西域。其后含义渐广,凡在我国西北之地概称西域。“汉武帝通西域时约有三十六国,其后又分至五十余国”。这些大小国家或地区其所在位置东边与汉朝相接,南北有大山,中央有河,东西长六千余里,南北宽千余里,地形地貌较为复杂。

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:“自玉门关·阳关出西域有两道,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,为南道”;“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,波河西行至疏勒,为北道。”

具体地说,通往西域的南路可从长安(今陕西西安)或金城(今甘肃兰州)出发,经敦煌、楼兰(今鄯善)、于阗、莎车等地,越葱岭到大月氏。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。大月氏以西到达安息,即今伊朗。再往西即可到达条支,即今伊拉克一带,最后直达大秦,即罗马帝国。



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

北路从长安、金城出发,经敦煌、车师前王庭(今新疆吐鲁番)、龟兹、疏勒,越葱岭到大宛、康居,再往西经安息也可到达大秦。

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,携带了大量金、帛,作为馈赠西域各地、各国的礼物。汉使和副使共同出使西域各地、各国,不仅抵达今属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,在今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,在今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的大夏,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的康居,还到达在今咸海至里海一带的龟兹,以及在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安息和在今伊拉克一带的条支等国。

丝路打通之后,为了便于交往,汉朝在通往中亚、西亚的路上,修筑了令居(今甘肃永登)以西的道路、设置驿站,为来往的使团、商旅提供食宿、交通和安全的保护。“汉通西域,遂为中西文明沟通之导源”,从此丝路文明声名远扬。

比较“一带一路”所到之处,目前,中国内陆地区连接欧亚大陆的多条铁路已开通:从2011年起,重庆第一班发往杜伊斯堡的国际货运列车发车;2014年1月,义乌至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班列开通;同年6月,合肥经中亚、俄罗斯,直抵德国、波兰等欧洲国家的班列启动;12月,从甘肃武威至阿拉木图的班列开出,最终可延伸至荷兰的鹿特丹港。运输日益繁忙,无疑能提高相关国家有效的购买能力,也能满足所在国家、城市和民众对于追求美好生活的诉求。

虽然由于战争、社会、经济、环境等原因,原本属于古丝绸之路南北两线路径的有些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参与到“一带一路”之中,但“一带一路”沿途所开拓的经济圈,却比原有丝路经营的范围大为扩展。文明史观重视未来,“一带一路”的前景将更为广阔。若能把欧洲发达的经济圈与东南亚活跃的经济圈相联结,从陆上把欧亚非贯穿起来;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,经中国沿海港口,过南海、进入印度洋,延伸至欧洲,或到达南太平洋,中国所倡导的“一带一路”将为世界文明带来无限的生机。

文明的多样性

张骞出使西域,开启了中国与中亚、欧洲互通商旅的交通大通道,同时,这条贯通中西的大道也有利于开发我国西部民族地区。由于在这条运输线上最多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精美的丝绸,由此,欧洲人就把中国称作“赛里斯”,即“丝绸之国”。之后,19世纪时,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丝路定名为“丝绸之路”,从此,“丝绸之路”称呼为各国所熟知。

在东汉光武帝时期,西域再次开通,西域地区国家继续遣使奉献。之后,班超受命出使西域,并派遣甘英出使大秦,沟通东西交通,进行友好交流,最远到达西海之滨,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和西域的关系,中西关系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。这时,中亚、西亚



张晓光/摄

校园新貌

「文化自信」铜质雕塑,增添了「书香今年,中央党校校园内设置了

各国通过驿道也常派使臣前来长安,他们看到汉朝“人众富厚”,“知其广大”,便利商旅,便“由此信之”,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进行。

文明史观关注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,将这些国家、民族关系放入到文明整体中进行综合考察,全面研究,从而可以看清在演进过程中的全貌。

世界上曾出现过不少文明形态,除中华文明外,还有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、被称为“西方文明摇篮”的古希腊文明,以及古罗马文明、古印度文明、古伊斯兰文明和玛雅文明等。

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,人口密度、人口结构、地理环境、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因素的不同,各种文明的发展就会有快有慢、有先有后,出现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文明发展水平的差异,形成以这些发源地为基础的不同文明中心,从而出现文明的多样性。但是,这些不同文明又有某些共性或共同的本质特征,即文明史的统一性。运用这一文明史观就能找到共性,找到其中的规律。

西汉时期国力昌盛、经济发展,但其发展动力是农业文明,生产力水平一般不高。其他古文明地区同样处在农耕文明,有的甚至是游牧文明,生产水平较低。古代丝绸之路通过交流,促使中国的纺织品、冶铁和造纸技术西传,而让西域各地用本地生产的毛毯、瓜果、汗血马等特产来交换丝绸珍品。有些国家再经商人转运到大秦(罗马帝国)等地,进而促进了各自的发展。之后,中亚的乐器、乐曲、舞蹈、雕刻、绘画、魔术等技艺也相继传入中国,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

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汉武帝在开通西域同时,也加强了与周边各国的联系与交往。当时,汉朝与朝鲜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。与越南的交往也很频繁,中国将大量铁制工具运往越南,越南把象牙、珍珠等输入中国。日本派遣使者来到中国与之交往,直到东汉时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中国与印度关系密切,张骞在大夏时就看到从身毒运来的中国苧竹杖和蜀布。此外,与缅甸、印度尼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都有良好关系。西汉末年,通过丝绸之路,印度把佛教传入我国中原地区。东汉初年,朝廷又派使臣到天竺去求取佛法。这时,汉朝对于南海、孟加拉湾的海上联系也开始加强。

尤其值得重视的是,公元166年(东汉桓帝永熹九年)大秦王安敦派使臣由海路经日南(越南北部的一个郡)来到中国,实现了中国与罗马的直接联系。

文明历史留给后人的遗产极为丰富,多个文明有时会形成共处的局面,各种文明交汇融合就能成为全人类的文明。文明史观要求人们善于古为今用,让古丝路这一文明结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见证,让古丝路成为当今世界各国、各个地区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借鉴,让古丝路在魅力无穷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广泛流传,更让新开辟的21世纪新丝路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走向现代化、创造现代文明的动力。这就是文明历史的社会功能。

有所思

非常时代的非常之人

——汉武帝刘彻用人史话(下)

□ 陈家兴

公元前135年,闽越王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,武帝便派大行令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分别援救南越。不过大军出发后,闽越王就被其臣子刺杀,武帝便下诏撤回军队。相比汉匈之战,这样的战事仿佛只是一个乐章,更多带有震慑性质。

一个锁配一把钥匙

事实上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汉匈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,并非源于汉武帝单方面好战。法国学者勒内·格鲁塞在其名著《草原帝国》一书中,就曾这样描述游牧民族:“草原上的这些短头型人,无论是匈奴人、突厥人或蒙古人——他们头大,身壮,腿短,是常年骑马的游牧民,这些来自亚洲高原上的‘马背上的弓箭手’们沿耕地边缘徘徊——在15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地袭击定居文明社会。”

而汉高祖刘邦就曾于平城被匈奴军队包围,以致“七日不得食”。如王恢所言,汉与匈奴和亲,大概总是维持不上几年,他们就又背弃盟约。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,与其说汉武帝“好四夷之功”,不如说他因势而谋、顺势而为。正所谓时势造英雄,“勇锐轻死之士”辈出也是必然。但若无汉武帝的用人谋略,则英雄必无用武之地。

当然,武帝时代的汉匈之战,则是由汉发起的。在公元前135年,匈奴曾前来请求和亲。当时大行王恢意见是发兵攻打匈奴,韩安国则主张和亲,群臣大多附和韩安国,于是汉武帝便允许汉匈和亲。

就在这短暂的和好期间,卫尉李广和中尉程不识,原分别驻守云中郡和雁门郡,于公元前134年6月被罢免了职务。这两人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,治军理念完全不同,

李广很随意,没有固定编制,不讲究排列阵势,夜间不敲刁斗巡逻,但也远远派出侦察哨兵,军营未曾遭到袭击。程不识则治军严谨,军队不能随意休息,也没有遇到危险。但是,匈奴人更害怕李广的胆略,汉军士兵也多愿意跟李广作战,不愿隶属程不识。

司马光就此有一段议论,他说:“以广之材,如此焉可也,然不可以为法”,“效程不识,虽无功,犹不败;效李广,鲜不覆亡哉”,意谓这样做,李广可以,但别人不能效法。效法李广,很少能避免全军覆灭的结局。这个说的在理。但在对付当时机动性、灵活性强的匈奴军队,不能不说李广的办法可能更有效,侦察哨兵即是他的耳目,比外在的巡逻更管用,同时不设防的营地,反而易让匈奴军队生疑。

在今天看来,这实际上涉及两类人才的任用问题。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把锁的,就是人才。否则配备再多标准钥匙,开不了锁也白搭。对于具体人才来说,不能用一个标准一刀切,应允许人才有自己的个性,倘若要求李广们如程不识一样,恐怕会扼杀天才。反之,让程不识们去效法李广,恐怕全部玩儿完。这里的关键是,不同人才都要为我所用,同时允许不同人才尽展其才,而不去横加干涉。

“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”

接下来,大汉的历史舞台上,就是卫青、霍去病等名将的出色演出,他们屡次对匈奴作战,取得了赫赫战功。

公元前129年,匈奴入侵上谷郡,杀害抢掠官吏百姓。武帝派遣车骑将军卫青等四将出兵。结果公孙贺一无所得,公孙敖、李广

被匈奴打败。李广还被匈奴活捉,靠装死麻痹对方抢其马、夺其弓而逃脱。只有卫青打了胜仗,因而被赏关内侯的爵位。

卫青“虽出于奴隶,然善骑射,材力绝人,遇士大夫以礼,与士卒有恩,众乐为用,有将帅材,故每出辄有功”。古人讲“猛将必发于卒伍”,卫青更是出身于奴仆,武帝起用卫青,在当时可谓非常之举,而卫青屡立战功也表明武帝知人善用,“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”,可谓众人皆服。

第二年,匈奴再次入侵,武帝再次起用李广,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,匈奴称李广为“汉之飞将军”,畏避他而连续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郡。不因李广一败而弃用,是武帝的开明处。但武帝有点迷信,觉得李广运气不好,以致后来李广饮恨沙场,这是后话。

用人态度上的拐点

这时候,武帝开始越来越重视人才的举荐,为此于公元前128年下诏说:一个郡竟然不向朝廷举荐一个贤人,这说明政令教化不能贯彻下去,而那些积累了美德善行的贤人君子,被阻塞、被壅蔽,使天子无法得知。“且进贤受上赏,蔽贤蒙显戮,古之道也。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!”有关官吏便奏报:凡是不举孝子弟的,属于不遵守诏令的行为,应当按“不敬”的罪名论处;凡是不察举廉吏的,就是不胜任职务,应当罢免官职。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。对不举荐人才者论罪,武帝这是要动真格,也表明武帝重视人才,亟待人才。

当时,临淄人主父偃、严安,无终县人徐乐,都向武帝上书议论政事。主父偃在齐、燕、赵各地活动都“莫能厚遇”,家贫而

借贷无门,便西入关中给武帝上书,早上把上书转呈武帝,晚上就被召入宫中拜见武帝。主父偃上书“所言九事”,其中有一项是谏止征伐匈奴的:他引述《司马法》说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;天下虽平,忘战必危”,指出“夫务战胜、穷武事者,未有不悔者也”。这些道理似乎不太合武帝胃口。但武帝对他们都很欣赏,对他们说:“公等皆安在,何相见之晚也!”确实有点求贤若渴的味道。武帝把他们都任命为郎中,主父偃更受信任宠幸,一年内升了四次官职,担任了中大夫。

不过,主父偃的被杀,则可以看出是武帝对待人才态度上的一个拐点。其求贤也急,其杀才也疾,当从主父偃开始。

在公元前127年,主父偃就被全家灭族。这一年,他曾劝汉武帝实行“推恩令”、设置朔方郡,亦可谓有功朝廷。不过,主父偃有点横行无忌。他曾说了一句后世知晓的名言:“吾生不五鼎食,死即五鼎烹耳!”表明他不愿意默默无闻,不论生与死,都要过响当当的人生。他年轻时曾游历齐和燕、赵三国之地,未被赏识,等到他身居高位,即在不长的时间里接连毁灭了燕、齐两国,在外人看来多少有点公报私仇的意味,于是赵王刘彭祖害怕自己成为下一目标,便上书告发他接受诸侯贿赂,使诸侯王的子弟大多得以封侯。当时,武帝认为是主父偃逼迫齐王刘次昌自杀,就把主父偃逮捕下狱。武帝不想杀他,但公孙弘说:“陛下不诛偃,无以谢天下。”公孙弘这一说可谓关键一推,主父偃再无活路,武帝便灭了其全族。司马光称汉武帝“行法无所假贷”,此之谓也。

选人用人史话